

文学魅影与生活镜像

著 黄建国



西北大学出版社



WENXUEMEIYINGYUSHENGHUOJINGXIANG

文学魅影与生活镜像

黄建国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魅影与生活镜像/黄建国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604-3358-5

I. ①文… II. ①黄… III. ①文艺评论—文集
IV. ①I60-53②J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1777 号

文学魅影与生活镜像

著 者: 黄建国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331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6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358-5

定 价: 30.00 元

目 录

作家作品研究

- 王蒙对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的探寻 /3
- 《爱尔克的灯光》：一把开启巴金精神之门的钥匙 /15
- 评杨争光的几篇短篇小说 /26
- 沉郁、雄浑、壮丽的崇高感——路遥小说的美学风格 /34
- 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 /41
- 论《白鹿原》的生命意识 /53
- 知青文学对农民和乡村文化的认知与审视 /64
- 理想追求与自我省察——新时期知青文学主题的理性嬗变 /74
- 明清文言小说狐意象解读 /87
- 被强迫中止的生命之旅——《十二点的列车》意蕴解读 /97
- 笑傲于小说与电影之林——杨争光印象 /105
- 王戈及其创作 /109

小说文体探微

- 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小说创作 /117
- 短篇话本小说的结构艺术和审美价值 /125
- 短篇小说结构的凝聚点 /132
- 短篇小说语言的浓缩性 /139
- 互联网时代的小小说 /147

关于小小小说的自言自语 /154

小小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诗 /156

过目难忘:小小小说的追求 /158

小小小说的“不能”和“可能” /159

简论小小小说 /161

好的小小小说闪耀着神性之光

——答《百花园》杂志社任晓燕问 /162

小说创作杂谈 /165

我写《谁先看见村庄》 /168

书文影视评析

风吹草低见牛羊——读《延河》'94 西北作家专号 /173

小说的另一种写法——读罗布·格里耶的《模特儿》 /178

智慧之光——读博尔赫斯的《两个人做梦的故事》 /181

徐柏荣的《故园木芙蓉》赏析 /183

平常夜晚 寂寞青春——评《平常夜晚》 /185

杨磊和他的《故乡小溪里的狗耳朵》 /187

读王潇然散文集《望未央》 /189

长篇小说《田韩堡》简评 /191

感激与尊敬(代序) ——写在《〈论语〉学记》出版之际 /194

生活的歌唱者——《村夫三弄诗词集》序 /196

张俊儒和他的小说——《群花集》序 /199

电视纪录片《风情黄河》散谈 /201

《大鲁艺》的价值与意义 /204

生命的热烈礼赞——评电影《5·12: 汶川不相信眼泪》 /206

《阿妹的诺言》:一部有意味的电影	/209
用奇迹塑造创造奇迹的人——电影《钱学森》简评	/211

文学艺术散论

散文的审美特征与欣赏	/217
散文文体片论	/224
面对艺术	/225
大众文化时代的艺术教育	/227
文学艺术与和谐社会	/229
作家要担当起培育民族精神的使命	/237
答《华商报》关于高考作文问	/239
郭佩珍剪纸:生命之树的果实	/242
西部电影与台湾电影	/245
向往纯粹的写作	/247
把握自己的感知世界	/249
小说是一个魅影	/251

后 记	/253
-----	------



作家作品研究

○ 王蒙对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的探寻

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王蒙站在时代、社会、文化教育前沿,从一个历史参与者或见证人的角度,把握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搏,涵盖式艺术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风云变幻、诡谲起伏的人生图景。尤为重要的是,他以严肃的历史态度,揭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他不仅仅关注知识分子命运悲剧的成分,而且更多地关注那些不幸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和文化心理,着重表现他们的性格悲剧。由此,王蒙成为当代文学第一个真正睁眼看自己的人。

《活动变人形》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亮点,它表现出的是对自我的审视与追问,是对“关于命运与道路、责任和自由、理想和代价、生与死、爱与憎”等由时代、世界、民族、个人诸因素交织起来的逼人质疑所引发的思索,是对知识分子人格负面的自觉省视。倪吾诚,这个集知识分子百年命运为一身的中西文化碰撞间隙之中生存着的畸形儿,真正使我们感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和社会定位的迷茫与惶惑“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窝囊废?低智商?超高智商?可怜虫?毒蛇?落伍者?超先锋派?享乐主义者?流氓?市侩?书呆子?理想主义者?”(《活动变人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

倪吾诚的人生经历和中国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

几乎是一样的,他既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又是西方文明的洗礼者和觉醒者。然而当他置身于三个女人构成的封建文化形态的坚固堡垒时,他既攻不破堡垒,又无法走出堡垒,最后只能在虚无哲学的泥潭中浑浑噩噩、自欺欺人:“我不能有益于国家民族,还不能有益于自己吗?我不能有益于自己,还不能糟践自己、毁坏自己吗?我不能得到友谊、爱情和尊敬,还不能得到轻蔑、误解和仇恨吗?”他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个在世间戴着镣铐跳舞的游荡的影子。倪吾诚的深刻的悲剧意义使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历史质疑:中国的知识分子既无自我拯救之力,又何以去拯救民众和社会?倪吾诚介入历史过程的尴尬处境和一无所成,即在一个外在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内在的动力已无济于事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又是什么呢?

《活动变人形》既昭示出作家对知识分子主体完成了从外向内、由表及里,从自卑、自恋到宽容、理解直至严峻批判的心态转换过程,也标志着知识分子自审意识的真正觉醒。知识分子这种文化心态的觉醒,在王蒙的长篇“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王蒙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以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严肃态度和无畏勇气对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世界及其人格进行自审,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种种病态。知识分子虽然饱经苦难,但这苦难也许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参与酿成并为之推波助澜的。他们既是封建文化的牺牲品又是封建传统的负载者;既是受害者,又是自害者和害人者。“季节”系列长篇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直面现实的残酷问题:作为那段历史的参与

者和见证人、愚弄者或被愚弄者，知识分子自身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作为民族的智慧、社会的良心、民众的先导，知识分子本身问心无愧吗？

王蒙的小说就这样在促使我们更脚踏实地去“思索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革命”，而且，这种思索突破了以往对知识分子认识的一种单向度的机械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睿智的目光重新审定一下他的生活，从而看到，最要紧的事情，并不是识破那些明显的恶行，而是看穿那些曾经认为是善的行为”^[1]。王蒙并没有仅仅止于知识分子生命存在的表层，去发现所谓的正面和负面、美德和弱点，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和弱点往往是同根同质的，越趋于生命人格核心，越归于同一本质。这样，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改造一直难以跳出一个命运的矛盾圈：即使是那些与旧的传统文化做最彻底决裂的人也并不能真正与之绝缘，却常常在自以为改造旧文化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被旧文化所改造和吞没。这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深刻的生命悲剧和历史悲剧。在王蒙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最深刻的生命悲剧和历史悲剧，主要根源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知识分子的两种美德：启蒙心态和历史使命感。对知识分子启蒙角色和历史使命感的质疑，也正是王蒙自审意识的最终归结点所在。

王蒙看得很透彻：五四以来“体现着社会道德与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式的激情”以及“有意地强调着自己的文人的趣味、雅致、温馨、教养和洁净”，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的自以为是而已，他们自以为比读者高明，摆出“先行者、殉道者的悲壮与执著，教师的循循善诱，思想家的深沉和睿智，艺

术家的敏感与特立独行,匠人的精益求精与严格要求,执行把读者拉到推到煽动到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的任务和使命,其实是知识分子处处想高出读者一头的“自我完美无缺”的历史幻觉而已。^[2]如果说《活动变人形》只是以知识分子畸形儿的表象提出问题症结的话,那么《恋爱的季节》则开始拿起了手术刀。“恋爱的季节”是一个精神膨胀的年代。精神的力量借助于政治的势力,覆盖着整个生存领域,成了一个渗透一切,而且至高无上的东西。一时间,精神的追求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替代了踏踏实实的客观生活实在,过去与生活紧密交织的诸如美、信仰、崇高、真诚、爱等精神理想,却成了悬浮于空中审判灵魂的枷锁。在《恋爱的季节》里,我们看到这些“自以为把握着社会的舵盘,吹奏着历史的号角,牵引着生活的缰绳,建筑着只属于未来的精神大厦的青年主人公”被一种伟人想象中的社会整体需要(革命和信仰)所同化,最终却成了生命以外的,冷漠空洞而又无处不在的精神理念(政治、革命、主义等等)的崇拜者和奴隶,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一个空洞的影子,一个精神符号。他们的“恋爱”,只不过是他们这种非生命形态的演示而已。

在符合“恋爱规则”的舒亦冰和有着革命理想、激昂开朗但个头矮小的满莎之间,周碧云之所以最后选择了满莎,是因为“在五月初的这个周末的晚上,周碧云越来越感到她对满莎的拥抱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魔法的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爱情幻觉,在这里,所谓的“魔法”无非是指当时的时代氛围,是指革命。从理性的分析来看,周碧云爱的不是具体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男性,而是她心里的“理念”。其实她所选择的并非满莎,而是革命;满莎只不过是革命的一个符号,一个替代品而已。洪

嘉是一位有着“唯我独尊”思想色彩的女青年，一切言行乃至情感都充分政治化了。她把恋爱当作一种纯粹的革命行动来看待，在这种思想驱使之下，她走上了“乱爱”的极端。洪嘉受到苏联小说《士敏土》中黛莎甘愿用自己的肉体去安慰红军伤员事迹的启发感染，听完一场报告后，便宣布与年龄比自己大两倍的伤残老战斗英雄订了婚。被迫解除婚约不久，听了一位“诗人”向她朗诵偷来的一首诗后，又激动地与这位刚刚认识的男性彻夜散步狂吻；天一亮她听出对方的言论味道有些不对头，就立即与之一刀两断，堪称“闪电式”的恋爱。

他们在“恋爱的季节”普遍表现出来的自我灵魂的主动分裂从另一个方面暴露出了知识先驱者以“自我牺牲的心理模式”为基础的启蒙心态的严重缺憾。王蒙小说的意义，就在于痛切地指出了如果“现实的具体要求”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相悖时，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如果缺少了人格和个性意识的独立支撑，对其自身来说，就是一种人格的扭曲和精神的自杀。

当知识分子在人格尊严和个性意识严重真空下的社会角色的自觉认知被强行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之后，“失态”就是他们唯一的必然反映了。《失态的季节》相当传统地表现出那段历史语境中的“右派”知识分子肉体与精神的惶恐与恐惧、不解与失措的状态，于是钱文感觉到“雨声变成了怪笑，这笑声不但稀奇而且有持续不断永无休止的可能”、“雨声不再像是笑声了。雨声像是催促和呐喊，像是一片乱哄哄的喊叫：哇啦哇啦哇啦，淅沥淅沥淅沥，滴答滴答，斗啊斗啊斗啊，打啊打啊打啊……他简直无地自容，他在雨里。”听觉的变异说明钱文内心深处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产生了一种难以排解的极度恐惧感，这种恐惧

感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钱文生理的“失语症”的短暂发作，“发生了最惊人的事情：他失去了声音，他张开了嘴。他的嘴哆嗦，下巴哆嗦，眼睛乱眨磨。一点儿也没有声音。”许多年后，钱文回想起这件事仍然羞愧难当。他究竟要干什么呢？他要交代他自己也完全莫名其妙的问题么？而那位鲁若，则“抓着自己的头发，他的脸上是一片空虚。这实在是最最可怕的面孔。不是损伤，不是疾病，不是恐惧，也不是丑陋，而只是被彻底地抽走了灵魂的什么都没有”。至于萧连甲，当他最终屈服于曲风明之后，“无法不感到自己几乎成了一个强奸犯。他在终于被板上钉钉地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从党内人民内部清洗出来以后，自然念念不忘我这个妙喻，见人就讲这个妙喻。”简直成了鲁镇上的祥林嫂。

在自我人格和个性意识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如此“失态”的知识分子必然“觉得不知为什么此身非己所有，此刻非己所有，快乐非己所有，转眼间只能有批判批判认罪认罪劳动劳动了”。当集体、组织、党、信仰成了社会整体存在的整体化身时，他们也必然为了尽早实现自我符合社会的需求，自觉自愿地去接受“组织”对自己的审判与改造，去接受信念对自己的监督与裁判；在下放劳动改造时，心甘情愿地说服自我变成为对人民大众心悦诚服的学生和改造对象，全身心迎合、投入到中国严酷的现实。但是，历史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没有独立人格与个性意识支撑，没有个人自由的获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由实际上是无法获得的。当整个民族的人民都以牺牲“自我”的代价去适应社会的整体需求，必然会造成全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扭曲变形，带来整个民族的“精神膨胀”，陷入臆造的

“精神天国”里夜郎自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蒙小说的现实力量是震撼人心的。

不仅如此。王蒙小说自审的锋芒进而对准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人性,使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历史现实:在历次改造运动中,被整的多数是知识分子,整人的也多半是知识分子,而且整法之无情、之厉害、之残酷、之恶毒,令人不寒而栗:为了达到目的,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自己超人的改造虔诚;为了保全自己,不惜栽赃陷害、无中生有、出卖朋友,不惜踩着他人血淋淋的残躯。知识分子在异化,不是异化为狼就是异化为羊。有的人是先狼后羊,有的人是先羊后变为狼。这就是《失态的季节》给我们留下的知识分子的总体印象。

人性扭曲和人格异化的结果导致了知识分子之间的自虐与更为严重的他虐行为的出现,导致了受难者之间种种令人发指的互相倾轧互相欺辱的丑恶现象的产生。萧连甲在被定成“右派”后从对别人的检举与批判中醒悟到写揭发材料也是能上瘾的,他“居然写得痛快起来,他体验到一种批判别人整别人硬是把别人分析成反革命的快感,咬牙切齿而痛快淋漓”。在下放劳动的权家店,知识分子批判一个晦气鬼的时候,“一个个显得多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才华横溢、舒卷自如、谈笑风生、从容不迫、入木三分而又雍容大度呀!人是通过批判别人来实现自己的优越与自信的,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他们“全都调动起语言的潜能,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刀我一剑,真是把费可犁千刀万剐了个体无完肤、无地自容、语无伦次、丑态毕露、稀里哗啦散了架”。章婉婉的自虐行为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她的

丈夫秦经世也被揪出来之后,她居然残忍地“拒绝了秦经世与她享受夫妻生活的快乐的要求,她咬牙切齿地强调,帽子没有摘以前什么都不要再想了”。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次休假机会的时候,“她主动要求一个女干部搜查她的内衣内裤和私处,人家说这么早怎么可以去叫醒谁呢?于是她表示,不经过彻底的搜查她宁可放弃休假。”具有他虐与自虐倾向的不止章婉婉一个人,比如钱文也曾经在半夜里点起灯对自己进行搜查,连一块表他都难以断定“是不是自己的呢?会不会洪嘉的表也是这个牌子这个型号的呢?他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块表一定是他的而绝对不可能是洪嘉的呢”。人人自虐的结果是“右派”们的集体性自虐“像歌里唱的那样,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啊,如今是一旦把我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中国知识分子,正像王蒙在小说里通过洪嘉所责难的那样:“到了这个分儿上了,不踏踏实实地劳动,整天折腾个什么劲儿呀!你们可真是资产阶级呀!资产阶级嘛,一个个都损人利己嘛!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尔虞我诈,两面三刀,落井下石,残酷无情,这些个毛病你们可都有哇!”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正视或深刻自省到自身人格弱点或个性痼疾,那么他们决不可能实现其启蒙民魂、导引民众的理想和抱负。

王蒙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另一个拷问点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历来都是非常宝贵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培育出来的,应该回报社会,对社会承担责任,正是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高度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构

成了民族的脊梁。或许可以说,没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是非常沉重的,他们一旦参与社会、参与政治,就往往不自觉地丢弃自我,与时自化,踏上“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治国平天下的不归路。显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的这种外在实现形式,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民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摒弃了陈旧的道统与君统,却又作法自毙,背上了新的包袱——主义与法统,其沉重并不下于道统与君统。主义与信仰结合而成为意识形态,法统则是国家权力的语言符号。”^[3]正是对“主义与法统”的自觉认同和与时自化,使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暴露出了巨大的缺憾:对政治与国家的绝对服从和依附。

王蒙小说恰以此为切点,展示了背负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生命追求的种种误区。当《恋爱的季节》中的周碧云、洪嘉等一批知识分子虔诚地把自己圣洁的“恋爱”奉献给一个神化了的信念的时候,当《失态的季节》中的钱文、萧连甲们不遗余力地去说服自身从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绝对观念和这个观念所命定的社会角色——赎罪者或被改造者的时候,我们不难产生这样的疑问: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保证性,保证他们所坚持的用以改造或说服自我进行被改造与教育的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系统准确无误而非纯属虚构?王蒙的小说向我们昭示的正是出于对组织、信仰的绝对虔诚,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和全部力量共同置于那个永远绝对正确的最高意志的祭桌上了。而“信念不仅仅是信念着,而且还包含信念什么”。当目的成为一个不明确的概念和一个非实在性存在的时候,作为过程的献身便具有更大的